

# 從「現代」派作家走向政論家的杜衡

## 另眼看作家系列之十四

蔡登山 ◎ 文字工作者

杜衡，本名戴克崇，曾是一個小說家，出版過《石榴花》（短篇小說集）、《懷鄉集》、《叛徒》（又名：《再亮些》）、《漩渦裡外》（長篇小說）；更以「蘇汶」的筆名寫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更編有一部《文藝自由論戰集》。而讓他最享盛名（抑或惡名）的是「第三種人」的稱號。而在抗戰軍興以迄逝世前，他卻盡棄文藝，從事政論工作，從香港到重慶到南京，最終落腳臺灣，從文藝作家變成政論家，完成另一個不一樣的杜衡！

1938年5月，杜衡來到香港，先是住在西環學士台、桃李台一帶。杜衡到港後在蔚藍書店工作，並因陶希聖的推薦主編《國民日報》的副刊《新壘》。卜少夫一家也於這一年到了香港，住在學士台下面的桃李台裏。1938年下半年，詩人路易士來了，並且搬進了卜家租住的那個樓中。同年冬天，胡蘭成也搬到了學士台，他在上海淪陷後被調到香港的《南華日報》擔任總主筆，同時在蔚藍書店兼職。杜衡供職的蔚藍書店，是國民黨政府戰時研究國際情勢的機構，由汪精衛派系的人掌管，共事者有樊仲雲、林柏生、梅思平和胡蘭成等人。

1939年3月26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成立，杜衡也由戴望舒介紹加入了文協。稍後，杜衡被謠傳依附汪偽，在「某先生所辦的某書局任事，每月拿港幣一百多元，知恩圖報，就變了某派，主起和來」，「完全投靠了國民黨」。戴望舒聞知極為憤怒，並親自宣佈開除他的會籍。曾經是「文士三劍客」的好友，至此正式分道揚鑣、形同陌路了。1940年1月，陶希聖毅然脫離了汪精衛集團，杜衡跟隨著他於民族大義上是不曾有虧的。因此文協香港分會經過討論於同年8月9日恢復了杜衡的會籍。

陶希聖從上海到香港後，創辦的「國際通訊社」，杜衡加入一起工作。陶希聖說：「杜衡的工作是每個星期從多種英文定期刊物中，選定其有關國際局勢及中國抗戰的論文，並自行翻譯一部分。同事們，分擔翻譯工作，並將譯稿集中於杜衡之手，由他編排付印，並主持最後的校勘。」杜衡的家先是搬到了九龍佐敦道，後來又搬到天文台道。路易士曾於1939年回上海，1940年又回港，由杜衡介紹也進入國際通訊社。他與杜衡同住同遷，兩家常把小菜拼在一桌吃飯，名之曰「混合餐」。



1942年，杜衡隨「通訊社」同人到達重慶，住在重慶南岸海棠溪附近的南方印書館印刷廠後進的山坡上，幫助南方印書館做編譯工作，後來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在南方印書館印行，杜衡參與校勘，書成之後，蔣介石特贈以署名玉照，以示嘉許之意。1943年11月15日，胡健中接任《中央日報》社長，陶希聖擔任總主筆，約杜衡擔任主筆，先在重慶的化龍橋，後來搬到黃家埡口，如此工作將近兩年。陶希聖認為他由文學家轉為政論家，就在這兩年之內。杜衡的好友路易士（紀弦）也這麼說：「抗戰爆發後，杜衡到了香港，就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已漸漸地放棄文藝，而把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用在經濟學上面了。香港淪陷，他去重慶，從此以後，他就不再搞文藝了。……我想不外下面幾個原因：一、由於抗戰爆發，從前常在一起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們都各自星散了，他一個人也提不起什麼興趣來。二、抗戰期間，整個的文壇幾乎全讓左翼份子給霸佔了，他和那些『左鬼』（我們習慣地稱左傾文人為『左鬼』）說什麼也合不來，瞧著不順眼，就索性放棄了文藝。三、他也許是想在經濟學方面，從根本去推翻那些『左鬼』所倚為靠山的馬克斯主義——果然如此，他的放棄文藝，就不但不是一種消極的行為，而且是一種積極的表現了。」

1945年抗戰勝利之前幾個月，杜衡與陶希聖共同翻譯3本軍事學的書：一、《拿破崙兵法語錄》（根據英文譯本），選輯拿破崙用兵的名言一百幾十段，相當珍貴，由杜衡初譯，陶希聖再校勘。二、《克勞塞維茨的戰爭原理》是克勞塞維茨的戰爭哲學的心得，簡單扼要，條分理析，杜衡譯得流暢而通達。三、《孫子兵法中英文對照本》這是舊書重印。這三本書出版時，適逢抗戰結束，因此都賣不出去，但前兩本書後來卻成為軍事訓練的重要參考書。

抗戰勝利後，1945年11月14日，馬星野接任《中央日報》社長，次年5月5日，中樞正式還都，杜衡帶著妻女隨《中央日報》社的專機還都南京。當時陶希聖因經常奔走於南京與上海之間，因此社論就交由王新命、錢納水與杜衡幾位主筆撰寫。陶希聖說：「新命的火辣、納水的老練、杜衡的細緻，各有所長。杜衡的文章大抵是在國際局勢與國際問題的分析與評判方面。」當時也任主筆的蔣君章回憶說：「當時《中央日報》撰寫社論，每一主筆，每週擔任兩篇，都在報館裡寫的；凡是輪值主筆，九時半就到報館，把當天的新聞通訊稿翻閱一遍，找可以寫的題目。總主筆陶先生有時也來，有時不來，由錢納水先生作代表；馬先生是每晚必到的。我們找到了可寫或應寫的題目後，與錢先生商議後與希聖先生聯絡，有時候希聖先生已有題目，或一連串的所謂計畫性的社論題，便來電話通知，寫什麼題目，並以內容要點見告。在計畫性一連串的社論中，希聖先生常常一個人執筆到底。」

1947年秋，《中央日報》社為培養言論撰述人才，特設「新聞研究班」招考大專畢業生為研究員，研習社論寫作和新聞編採，共錄取10名，杜衡擔任研習指導者之一。1948年10月30

日，馬星野請陳立夫董事長召開董事會，討論籌設《中央日報》太平洋版（後來正式出刊時改稱臺北版）於臺灣，並派總經理黎世芬赴臺籌備。

1949年初，杜衡隨《中央日報》社遷臺，當時的報社以臺北市漢口街為編輯部、社長室、主筆室等，以中正西路為經理部、廣告部及印刷部。杜衡在報社的安排下先住在臺北市洛陽街的一間小屋裡。繼續擔任主筆工作，致力於評論及專欄的寫作。當時總主筆仍為陶希聖，但他當時正隨著蔣介石僕僕於奉化、重慶等地，一直到同年年底才抵臺，總主筆職務實際上由主筆錢納水擔任，王新命、杜衡、殷海光均為主筆，而新聞研究班的研究員趙廷俊、江德成也兼寫社論。殷海光不久就離開《中央日報》到臺灣大學去任教，於是主要社論多由杜衡及錢、王三人撰寫。1949年5月3日《中央日報》刊載杜衡以「林阿火」署名的專論〈臺灣負擔不起〉，指責若干從大陸撤退來臺的官員、委員們仍如過往一般地作威作福，要求省政府接待供應，耗費龐大，使正在力求節約的臺灣省政府負擔不起。文中還指斥這批需索無厭的要員們為「政治垃圾」，當時轟動一時，並奠定《中央日報》在言論尺度突出的地位。國民黨撤退臺灣後不久即實行戒嚴法，限制辦報（即所謂「報禁」），《中央日報》（國民黨中央為後臺）、《中華日報》（國民黨臺灣省黨部為後臺）、《臺灣新生報》（臺灣省政府為後臺）成為臺灣五、六〇年代的三大報，尤其是《中央日報》在1949年3月12日出刊，不到半年的時間，便成為臺灣銷量最大，內容最豐富，讀者最歡迎的第一大報。

此外杜衡還被著名的雜誌邀約寫專論，在著名學者徐復觀所創辦的香港《民主評論》上發表〈免於偏見的自由〉（1949年8月16日）、〈民主政治，前進抑後退？〉（1950年1月1日）；在五〇年代，由黃紹祖主編的臺灣《自由世紀》刊物上發表〈政治的巫術〉（1949年9月1日）等文章。但寫得最多的還是《自由中國》。該半月刊是1949年11月20日雷震（在大陸時代曾是國民黨官僚體系中的一員）在臺創辦的，並由胡適擔任發行人，鼓吹自由、民主，批評時政。杜衡和殷海光是最初的主要撰稿人，後來才有夏道平及宋文明等人。他發表在《自由中國》的文章有：〈世界霸權與軍國主義〉（第2卷第4期，1950年2月16日）、〈論經濟的國權主義〉（第2卷第6期，1950年3月16日）、〈國內紛爭與國際組織（上）〉（第3卷第6期，1950年9月16日）、〈國內紛爭與國際組織（下）〉（第3卷第7期，1950年10月1日）、〈國家權力的界限〉（第4卷第5期，1951年3月1日）、〈國民經濟論與戰爭（上）〉（第4卷第11期，1951年6月1日）、〈國民經濟論與戰爭（下）〉（第4卷第12期，1951年6月16日）、〈權力慾與民主政治〉（第6卷第4期，1952年2月16日）、〈從間接民主到直接民主（上）〉（第6卷第12期，1952年6月16日）、〈從間接民主到直接民主（下）〉（第7卷第1期，1952年7月1日）、〈從經濟平等說起〉（第7卷第8期，1952年10月16



日)、〈凱恩斯的乘數原理(上)〉(第9卷第10期,1953年11月16日)、〈凱恩斯的乘數原理(下)〉(第9卷第11期,1953年12月1日)、〈凱恩斯的投資理論(上)〉(第10卷第10期,1954年5月16日)、〈凱恩斯的投資理論(下)〉(第10卷第11期,1954年6月1日)、〈論信用政策〉(第14卷第3期,1956年2月1日)等文章。

從這些政論文章,可看出杜衡的知識淵博,他甚至涉及到經濟層面。因此他的同事宋文明說杜衡:「他思維敏捷,瞭解深刻,最易把握一個問題的核心。所以他不論從事文藝創作,研究一般社會科學與經濟學,或撰寫政論,他都有獨到的見解,也都有極大的成就。早年他從事文藝寫作,已曾蜚聲全國文壇,及後專門鑽研經濟學,據這一方面的學界人士相信,其成就可以與國際間的許多大經濟學家相比。至於他政論寫作的邏輯謹嚴,有見地,文字技術的優美,清爽與動人,更在整個中國數一數二。根據我個人撰寫社論二十年的經驗來說,這種文章很難寫得稱心滿意,但杜衡兄所寫的社論文章,不論是討論任何一類的問題,都可使人覺得可圈可點,引人入勝。假若讀臺北報紙的社論文章,尤其是有關政治及社會問題的文章,使人覺得讀了一遍還想再讀第二遍第三遍,這篇文章大半皆出於杜衡兄之手。假若我們的國家強盛,中國在國際間有地位,而杜衡兄的文章又都能署名,我相信杜衡兄早已是世界聞名的人物,早已是世界第一流的學者和作家了。」

1953年4月5日,陳訓恂出任《中央日報》社長,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的張其昀推薦他在浙江大學的同事謝幼偉擔任總主筆。謝幼偉是造詣頗深的哲學教授,但新聞背景與時間觀念卻較淡薄,實不宜擔任此在政治上甚具敏感性的職務,但當時正強調增強黨的秘書長權能,因此並未遭反對。聽說在6月間,杜衡寫了一篇社論,總主筆謝幼偉在杜衡的文章中增添了一百多字。社論見報後,蔣介石大為震怒。動怒的原因,便是那續貂的文字出了差錯,於是在「棄車保帥」的情況下,杜衡二話不說上書請辭,不過「帥」也未安然過關,幾個月後(1954年3月1日)社長及總主筆兩人也都黯然離開了。名報人陸鏗說:「《中央日報》遷臺初期還是不錯的,後來只因出身宮廷的個別人,剛愎自用,擺出『忠黨愛國』的姿態,不是辦報,而是做官,違背了新聞自由的原則,反對新聞競爭,且排擠菁英骨幹如戴杜衡、江德成等,以致江河日下。」

而就在杜衡離開《中央日報》時,由當時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組(文工會前身)主任沈昌煥的安排,杜衡轉任《新生報》的主筆。緊接著《大華晚報》也立刻請他擔任專任主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臺北市有三到四家報社及雜誌聘請他撰寫評論,杜衡一時成為炙手可熱的政論家,10年之間,他曾同時為《新生報》、《聯合報》、《徵信新聞報》和《大華晚報》寫社評。

杜衡在公餘之暇，喜歡打橋牌，而且聽說技藝頗高。路易士早年在香港時曾經和他打過牌說：「杜衡除了精通橋牌理論，熟讀橋經之外，還會吵，會罵人，認真的不得了。要是侶嫂（案：夫人劉可侶）叫價或出牌稍有不合『理論』之處，他必定把她大訓一頓，就像老師訓學生似的，務必改正她的『錯誤』，重新叫價或出牌，直到令他滿意而後已。有時侶嫂也生了氣，把牌一擯，說不打了，他才會住嘴。否則，他的橋經是講到天亮也講不完的。」來臺後打橋牌還是他主要的消遣，同事趙廷俊夫婦就常去陪杜衡伉儷打牌，趙廷俊說自己雖技遜一籌，但玩得卻很愉快。趙廷俊又說：「集郵是他長期的嗜好，集存郵票的豐富和名貴郵票之多，當時可列入全國的前幾名。平劇他也喜歡，一次朋友在他家餐會，酒酣耳熱之後，黃紹祖先生引吭高歌〈聖塔露西亞〉，嘹亮動聽；戴先生唱一段〈擊鼓罵曹〉，頗有韻味，據他說學的是言菊朋腔調。」

1960年，《自由中國》雜誌結合本土政治精英，有意籌建反對黨，甚至挑戰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蔣介石迅速採取行動，9月4日，創辦人雷震及主編傅正等人被捕，雜誌也因此被迫停刊。據女兒戴薇說此時的杜衡「不惟喪失其熱心筆耕之園地，且斷絕其奮鬥求生之意志，乃鬱鬱寡歡如坐愁城，以致身罹重疾。」杜衡在《徵信新聞報》的好友汪彞定這麼回憶他最後的歲月，說：「後來他的健康開始惡化，記得是民國50年天氣漸漸轉冷的時候，他感覺不能上下階梯，每次約會在有樓的地方，他便有難色。我以為他是心理的恐懼作祟，往往勸他不必過份自以為發病難支，要鼓起勇氣，維持身體的潛力，而他在我與幾位朋友的勸促扶持之下，每次都參加了我們的聚會。事後也覺得並無不適，他自己還說這樣足以增加自信，卻不知道此時他的生命力已經在迅速崩潰之中，假如我們當時了解這一點，必不會勸促他勉為其難的。」

1962年4月25日，卜少夫給胡蘭成的信中寫道他在臺北見到杜衡的情景，說：「在臺祇有廿天，除陶希聖先生處，也去看了戴杜衡，他夫婦都老病不堪，尤其是杜衡，白髮衰瘦，患氣喘病，終年不出門，走幾步便上氣不接下氣，夫婦經常打針，但他卻是臺北最紅的主筆，他兼了4張報紙的主筆，幾乎每天要寫一篇社論或社評，每月收入約兩百美金（八千臺幣以上），有人說他能活下去，完全由於每天寫社論維持著的，倘使他不寫，也許便倒下來了。我不敢肯定。他和我談了半小時，談起過去學士台的朋友。看到他那樣子，我想哭。」時光催人老，往事不堪歎！

汪彞定又說：「51年（1962年）的冬天開始，他的病象顯然走向惡化。開始有出汗不止及哮喘不能控制的徵象，次年他以哮喘危急，入臺大醫院診治。雖然不久出院，而脈搏始終不能恢復正常。冬天（案：1963年10月14日）再遭喪偶之痛。當時我擔心他會受不起這打擊。但他終於以理智與旺盛的求生意志，克服了戴夫人去世給他的驚痛。不幸，僅僅三四個月後，



他終於不能抵抗身體機能衰弱的壓力，再度入院。自此以後，他一直賴氧氣的支持，延長了在人間的歲月。……以後，因臺中天氣乾燥溫和，適於哮喘病人療養，再為他接洽臺中的醫院送去治療。最初幾天，本報臺中辦事處人員告訴我，杜衡病情已見好轉，正替他慶幸，並預盼老友病癒歸來，同享談論之樂。18日深夜本報臺中辦事處忽然急電告知，他已經去世（案：實為1964年11月17日）。一個久在意中的不祥消息終於來了，回想10年交往而今人天永訣，不禁泣然。」

曾經是「總角之交」的施蠶存在晚年回憶老友時說：「1949年他隨《中央日報》去了臺灣，據說一直擔任《中央日報》的主筆，因揭發大官貪污而被解職，後來放棄文學活動，改行研究臺灣的經濟，發表過不少經濟評論，對六〇年代臺灣的經濟起飛具有指導和推動作用。他的這些文章，我在八〇年代後期才見到，而他卻在1964年病逝，他以前就患有肺病。如今想起早年文學工場時的情誼，一起編輯《現代》雜誌的日日夜夜，同訪來華參加『第二次世界反帝大會』的法國作家瓦揚·古久列的情景，恍如就在眼前，不免有些傷感。」

